



善品公社的9年探索——

社会组织如何打通产业帮扶“堵点”

本报记者 顾磊

静宁苹果、蔚县小米、普洱咖啡……春节临近，一场名为“善品助农年货节”的公益直播活动拉开序幕，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善品公社产业助农项目(简称“善品公社”)众多特色年货登场，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记者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获悉，截至2023年底，善品公社项目累计筹款1.97亿元。项目启动9年来，惠及全国22省(区、市)149县(区、市)的209个合作社，农户数达到85392户。

社会组织如何有效参与乡村产业发展，一直是个难点。一方面，参与商业竞争非其所长，助农增收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探索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要保证机构使命不偏移，业务凸显公益性。善品公社自2015年启动至今，为上述难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答案”。



舒兰市双永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供图

搭建一个助农平台

“产品很棒，全家人都爱吃，我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回购了。”谈起刚刚购入的“稻花香2号”舒兰大米，北京市民柳女士说。她的网购选择，为千里之外吉林省舒兰市双河村137位合作农户的增收作出了贡献。其中的“桥梁”，就是善品公社。

善品公社探索通过市场化方式增加农户和村集体收入，与电商平台合作销售，曾令四川雅安一个村庄的猕猴桃一售而空，村民直呼“不可思议”。

“小农户参与市场经营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单家独户难以形成规模，没有能力以合适的价格生产市场可接受的优质产品；其次，企业或土地流转大户的地标产品及其产生的价值，难以惠及小农户，导致小农户被排挤出农产品市场这个‘牌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说。

为了让农户能坐到市场环节的“牌桌”上，善品公社帮助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加入合作社，选出“能人”带领农户学会市场化经营生产，为合作社提供资金、培训、设计包装、品牌建设、市场推广等支持。目前，部分合作社已经具备市场化运作的的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8年以前，我们村是全县苹果种植的落后产区，外地客商和

专家常说我们是‘守着金窝子，过着穷日子’。”四川省盐源县龙东湾苹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兴志说。在善品公社的帮助下，如今，合作社社员从19户发展到213户，种植规模达7000亩，合作社销售额年均稳定在1500万元。

善品公社发展9年来，成立之初面临的规模、质量、信任度三大难题已得到显著改善。刘文奎透露，项目正在完善善品公社、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机制，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打造一家社会企业

“让全国人民都尝尝咱们的大米。”这是双河村农户们最大的心愿。善品公社的存在改变了过去小农户无力应对收购商压价的困境，以合作社基于市场实际行情制定的合理、统一售价出售产品，甚至在销售之后还能获得二次分红，这给了农户充足的信心。

善品公社以实现社会价值而非逐利作为机构的主要目标。这种有别于一般农业企业的形态被称为“社会企业”。社会企业一般被认为是通过商业手段实现社会价值的机构，但其认定标准存在分歧。

“我认为，根据我们的实践，社会企业有非常清晰的定义和边界。”数年前，刘文奎就提出了社会企业的3个标准：首先，机构宗旨或设立的目标必须具有明确的社会属性和价值导向；其次，必须是真正的企业，这样才能分红，进而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再次，必须通过制度性约束保障使命不偏离，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股权约定，确保三分之一以上股权归社会所有。

第三条标准源自公司法：“股东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应当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2015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独立成立北京中和农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此后又成立四川善品公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于2018年通过成都市“社会企业认证”。这一模式影响深远，例如，北京市2022年出台的《关于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意见》规定：“鼓励基金会采用包括股权投资在内的多种方式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9年来，善品公社的从农产品电商销售企业转变为如今的优质农产品供应链社会企业。刘文奎说：

“作为一个社会企业，我们虽然不一定以上市为追求目标，但会有足够的收入维持公司运转，让员工有体面的工作和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合作社农民在善品公社的支持下，每年春秋收获，通过生产优质农产品获得合理的收入，过上美好的生活。”

探索一条核心经验

善品公社发展至今，得益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余年来在产业帮扶方面的长期探索。它的成功既依托于成功的经验，也得益于失败的经验。

早在2000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大凉山地区开展的扶贫探索，通过“集中在一个村里做大项目”的方式，筹集了1000万元资金，按照每村投入200万元的规模，实施了环保、教育等25个子项目，虽然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并没有帮助村民脱贫，反思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产业上”，不搞产业，项目是无源之水，难以持续。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四川省绵竹市的民乐村开启了产业帮扶项目，确立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发展产业，二是建立合作社，引入现代企业制度。然而，项目也失败了，教训是：“片面依赖外来能人，难以融入村庄，得不到村民信任，大大增加交易成本和失败风险。”

2010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门达村开启新的探索。项目做到了两点：一是建立合作社，二是村里能人带着村民自己干。两年后，投入的300万元就赚回来了，合作社搞得红红火火。

“从2000年到2013年，我们在甘达村第一次尝到了成功的甜头。我们觉得终于成了，我们用了13年时间，证明乡村发展是有一条新路的。”刘文奎说。

甘达村的成功经验和方法在其他地区灵不灵?能不能总结出更多的果?从2013年开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尝试复制成功经验，产生了如今还在实施的百美村庄、善品公社两个品牌项目，取得明显成效。

如今，善品公社探索出的方法和路径，已被其他社会组织借鉴，这个局面也是项目设计者、推动者所希望看到的。刘文奎说：“我认为，乡村的发展应以产业为切入点，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公共服务实现乡村宜居，进而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以信息化管理为平台，联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协调多方力量，构建覆盖社区老年人全方位、高质量、精准到人的服务体系。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很多企业基金会也在尝试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创造性地应用于公益项目的组织、执行、传播等各个流程中。

“以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为代表的一部分企业基金会已经走了在发展新前沿，他们以数字技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桎梏，搭建共享机制，更好地链接社会需求，以创新的解决方式和实现途径，助力解决更多社会问题。”李颖丹说。

当前阶段，企业基金会发展仍存在不少短板。《报告》发现，截至2022年底，全国企业基金会的数量为1850家，发起企业基金会的企业占比仅为0.004%，企业基金会数量整体偏少。

同时，企业基金会发展还面临着“缺少相关制度保障，政策推动力度有限”“缺乏行业交流平台，无法汇聚发展合力”“资金获取渠道单一，过于依赖企业捐款”等多项发展难题。

“这些客观存在的发展难题影响了企业基金会的规模化发展，也制约了企业基金会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不利于企业基金会充分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共同富裕作用的发挥。”和众泽益主任、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王忠平说。

《报告》从政府、行业、企业基金会层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例如，应抓紧落实政策保障，依法规范助推发展；组织进行理论研究，引领公益实践创新；增强自身“造血”能力，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等等。王忠平透露，将进一步丰富关于企业基金会的理论与案例研究，为企业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江苏连云港发挥街道政协工委作用，基层治理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

群众“心上事” 我们“上心事”

朱先明 孙娟 本报记者 郭帅

日前，江苏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猴嘴街道政协工委微信群里发布了一条居民“微心愿”：环湖社区的重度肢体残疾人陈以好想要一辆轮椅车。几天后，连云区政协委员、猴嘴街道政协工委主任马源认领了“微心愿”，不仅给陈以好送去了一辆轮椅车，而且送去了2000元救助金。

民生无小事，近两年来，连云港经开区猴嘴街道政协工委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从群众家门口的“小事”入手，下足“绣花功夫”。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猴嘴街道政协工委充分发挥政协工委成员和‘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平台作用，列出10余项公益性服务内容，有效整合街道政协工委资源，采取‘点单式’模式，一件件落实民生实事项目。”马源介绍说。

猴嘴街道振云社区因休闲健身设施不配套，居民闲暇时只能聚集在巷口、

路边聊天。街道政协工委及时召开“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谈“心”事，“出点子”。很快，“口袋公园”开工建设，配备人行步道、健身器材等，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

“协商议事会”是猴嘴街道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推动基层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平台。该街道8个村(社区)定期召集村居民代表召开“协商议事会”会议。此外，该街道政协工委推出“五事共议”工作法，每月把街道政协工委成员、“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成员和辖区党员、群众代表、驻区单位、物业人员召集到一起，实现社区各项事务共商共建。

“把议事室建在居民家门口，把治理触角延伸到最小单元，实现基层治理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把群众‘心上事’当成我们的‘上心事’，切实做到‘小事不出社区(村)、大事不出街、难事不出区。’”猴嘴街道党工委书记戚连吉说。

“青年之桥”公益行动新项目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郭帅)1月12日，由花旗银行、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发起的“青年之桥”公益行动首届成果展示会暨新项目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首届“青年之桥”公益行动从调研到实施走过内蒙古、甘肃、四川等10个地区12所中职学校，帮助超1500名中职青年，通过明确三大目标和采用八项实施手段，围绕职业能力培养开展企业研学和实践，帮助青年找到强化自我认知、发掘自身潜能的路径，明确未来奋斗目标、明晰个人职业发展规划。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开展“青年之桥”公益行动，助力中西部地区中职青年学生感知新思想、接受新理念、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为青年学子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为他们插上腾飞的翅膀，假以时日，青年学子必定会学有所成，成为“博、大、仁、爱、心、爱、人”的重要实践者和传播者。

下一步，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将与花旗银行继续携手“青年之桥”公益行动新项目，围绕青年学生互联网营销技能培养等方面能力培养，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助力更多的青年人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走向成功的未来。

女性跨境电商计划在闽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由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简称“友成基金会”)联合UPS(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及UPS基金会发起的“UPS女性跨境电商计划”日前落地福建宁德，该项目由UPS捐赠资金，赠与亚洲(美国)北京代表处全程进行资金监管，福建省宁德市商务局和宁德市电子商务协会共同支持。

据介绍，友成基金会在乡村女性电商赋能领域已累积多年经验，“香橙妈妈”公益项目已培养了2万余名乡村女性电商创业者，助力21个省份170个县域的农产品通过电商走出大山。作为跨境电商重要主体的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女性小微创业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诸如运营能力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对跨境电商平台缺乏了解等问题。为了帮助这些女性创业者顺利出海，同时也为了促进女性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友成基金

会与UPS共同发起“UPS女性跨境电商计划”。该项目面向宁德市150名女性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家，通过线下系统培训、创业导师持续指导、创业资源对接等方式，帮助她们掌握跨境电商知识技能，提升综合素养，增加收入，带动更多女性创业者参与到跨境电商中。

“UPS女性跨境电商计划”的首批课程自1月8日展开。培训结束后，这些女性中小企业创业者还将获得3个月的线上培训与指导。宁德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UPS女性跨境电商计划”将切实发挥电商带头人示范作用，为女性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与支持，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本项目除UPS的捐赠外，友成基金会还动员福建省宁德市商务局、共青团宁德市委、宁德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等各界力量的支持，共同帮助跨境电商中女性小微创业者提升技能，增加收入，带动更多就业。

2023全国残障青少年艺术双年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1月18日，2023全国残障青少年艺术双年展颁奖典礼暨汇报演出在京举办。此次活动由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 and 北京金羽翼公益基金会主办。

据了解，自2023年8月21日启动报名以来，本届全国残障青少年艺术双年展吸引了来自全国13个省(区、市)的2088位残障青少年参与，同时受到全国30个省(区、市)的投票参与者的热烈响应。参赛作品丰富多样，包括超过3000件书画作品和1300余个表演类节目。

北京金羽翼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张军茹表示，双年展自2016年举办至今已是第五届，旨在发掘更多具有艺术才能的残障青少年儿童。活动通过搭建艺术交流展示平台，激励更多残障青少年锐意进取、奋发有为，进一步丰富残障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他们进一步融入社会，融入生活，为他们的艺术教育及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渠道和支持。

本届双年展评委会主席姜昆表示，孩子们不幸于身体的残缺，心中却绽放着美丽的花朵，他们体验着生命的曲折，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汇报演出现场



《2023中国企业基金会观察报告》发布——

企业基金会数量不足 有“三大创新”

本报记者 顾磊

《2023中国企业基金会观察报告》(简称《报告》)日前在京发布，该《报告》由北京和众泽益公益发展中心(简称“和众泽益”)撰写，系统梳理了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背景与历程。《报告》以数据为基础，从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基本情况、人力情况、项目情况、财务情况以及信息公开5个维度展现了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基本现状。

进入“十四五”阶段后，社会组织的发展重心由追求“数量”转为重视“质量”。2022年，我国社会组织整体增速下降明显，但企业基金会仍保持了正向增长，2022年新增企业基金会120家，总量达到1850家，呈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营企业成为企业基金会的重要发起方。截至2022年12月31日，企业基金会总量达到1850家，其中1392家企业基金会由民营企业发起成立，以75.2%的占比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报告》发现，广东、北京、浙江、上海、江苏的企业基金会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其中北京的企业基金会数量超过200家，广东的企业基金会更是将近400家，以绝对优势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

当前企业基金会有一个共同特征是，团队规模较小。根据现有数据情况统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1225家企业基金会的全职员工

平均人数为3.2人，而全国6021家基金会的全职员工平均人数为3.7人，两者较为接近。

现阶段，企业基金会主要投入何方?数据显示，教育、乡村振兴、公共服务是投入最大的3个领域。

2021年，企业基金会共计开展项目7871个，覆盖了10大领域。其中教育领域项目数量最多、支出金额最大，分别占比31%和24%；乡村振兴位居第二，项目数量占比28%，支出金额占比19%；公共服务排在第三位，项目数量占比16%，支出金额占比17%。此外，公益行业发展和安全救灾领域也有较多资金投入。

据统计，1850家企业基金会原始资产规模总量为110.81亿元，平均值为598.99万元，但大部分企业注册资金规模不大。原始注册资金在200万元及以下的企业基金会共有1168家，占比达63.1%。

研究发现，2012年至2020年间，企业基金会的年度总收入一直保持稳定，但是2021年，1467家企业基金会年度总收入为215.8亿元，较上一年度呈现负增长，为10年来首次。

《报告》调研团队介绍，企业基金会评级情况不乐观。2021年数据显示，871家企业基金会披露了等级评定的情况，其中5A企业基金会57家，占比仅有6.5%，超过一半的基金会未获得3A及以上

评级。

“中国企业基金会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一段时间快速发展，相当一部分企业基金会坚持守正创新，在运作模式、项目实践以及技术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和众泽益共同富裕与志愿服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颖丹说。

这些创新主要体现在运作模式、项目实践和技术运用3个方面。

近年来，平台型企业基金会逐渐崭露头角。这一类型的企业基金会不再单一依赖于企业提供的资源，而是通过整合更加多元的行业资源，实现更精准的公益需求对接，达成更有效益的合作。这既促成了行业生态内更多公益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也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好的解决方案。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无锡灵山公益基金会都是此类基金会的典型代表。

与大多数公募型基金会相比，企业基金会具有更加灵活的运作机制、更加稳定的项目资金、更加丰富的品牌资源、更加多元的合作伙伴、更加充沛的人才支持等公益优势，可以更有效率地开展富有创造性、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创新实践。

例如，山西省桐院慈善基金会的“桐院演讲”公益项目，通过公益人讲公益故事等方式传播公益慈善理念、文化、知识和方法。又如，北京泰康溢彩基金会的社区智慧养老项目，